

奉献，让生命升华

——缅怀父亲杨天堂

○杨明箴

2013年1月18日下午，暨南大学医学院郑锦鉴等三位同学带着新年礼物，带着祝福到我家拜访。他们代表广州市红十字会来慰问遗体捐献者的家属。我的父亲杨天堂先生于1997年元旦去世，我遵照父亲生前的嘱托，把他的遗体捐献给暨南大学医学院。

光阴似箭，屈指一数，父亲离开我已经整整16年了。随着时间的流逝，父亲的身影已渐渐远去。这三位同学的到来，又一次引起了我对父亲的无限思念。每当想起父亲，在我的心头总有无尽的热流涌动，久久不能平静。

父亲生前执教于暨南大学中文系。他一生经历坎坷，历尽磨难，疾恶如仇，从善如流，刚直不阿，光明磊落，自始至终有一颗滚烫的爱国之心。他年轻时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出生入死，奋力抗日；中年时弃学从军，不料含冤受屈，饱受磨难；老年时壮心不改，仍然忧国忧民，笔耕不辍，写下了一百多篇反腐倡廉的文章，最后又把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

父亲在世时很少向我们谈及他过去的经历。我对父亲的一生知之甚少。

只是作为女儿，在自己成长的道路上，因为受到父亲被错划为右派的株连，以致从小学开始，在升学、就业、婚姻诸方面都受到影响。这是我对父亲最直接的认识。我从来没有当面问过父亲，没有深究过父亲的“过错”，也没有因为自己屡受政治上的歧视而抱怨过他，尽量回避这些不愉快的往事，默默承受着这些莫名其妙的桎梏。记得父亲给我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苦难是一笔财富，你就像一座等待开发的矿山一样……”是的，生活的磨炼使我比同龄人较早成熟，我学会了忍辱负重，自强不息；懂得珍惜生命，自爱自重；懂得友谊，懂得感恩，怀一颗善良的心。作为女性，在我身上少了些许娇柔，多了几分刚毅。



杨天堂学长全家福

父亲去世后，在暨南大学为我父亲举行的座谈会上，在很多友人的追忆发言中，在地方志记载中，在媒体的报导中，在我为父亲整理文稿的过程中，慢慢地对父亲才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父亲 1918 年出生于河南邓州市一个较富裕的家庭。从小熟读四书五经。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他的私塾小伙伴在座谈会上这样回忆：“私塾先生叫我们背书是用针扎书页，而天堂是扎到哪页背到哪页，从未受到先生的打骂。”就这样一路顺风，直升当时河南省最好的中学——开封高中。1938 年父亲参加地下党组织，作为中共地下党书记，发展地下党员，领导学生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后任中共邓县宣传部长，利用家庭优越的条件作基础，在家中建立抗日游击队联络点，起草、印刷抗日宣言，打击敌人。在抗战的日子里，游击队经常在我家吃住，在我家的大客厅里总是为他们准备几桌饭菜招待。难怪我家当家的长辈不解地说，怎么天堂有那么多的同学长期在我家吃住！父亲也因参加了地下党而遭到国民党的追捕，后因组织被破坏，险些送了性命。

1941 年父亲考进了西南联大，师从朱自清、闻一多等著名学者。在大学读书期间曾任学生会主席，领导学生进行抗日活动，参加保护闻一多等进步师长的运动。抗日战争胜利后，西南联大回师北迁，父亲 1947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教了一年书后，于 1948 年考进清华大学研究院，想继续追随朱自清先生进行文学研究。但是在那个民不聊生的动荡年代，作为学者、教授的朱自清先生的生活也无法保障，而又签名拒领美国的救济粮，因贫病交加英年早逝。父亲悲愤地护送

导师的灵柩安葬。1949 年，正在读研的父亲接到派去苏联留学的通知，但他征得导师的同意，保留研究生学籍，毅然参加了解放军南下工作团，等全国解放后再回来安心读书。可惜这样的机会再也没有了，南下后被留在长沙省革大、省党校当教员。他作为马列主义教研主任，给地级领导授课，获得很高评价。不料在 1957 年整风运动中，他提出共产党应该反腐倡廉，反对以权谋私等意见，被认为是“毒草”，是“恶毒向党攻击”。父亲因坚持自己的观点，一再申辩，结果行政级别连续降了八级，最后被划为“极右”分子，送去劳动改造。1961 年虽然摘了“帽子”，仍受到歧视，每次政治运动都受到冲击。每想至此，我都为父亲的不幸遭遇而唏嘘不已。

幸亏天无绝人之路，处于尴尬境遇的父亲，得到南下工作团的团长、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同志帮助，1964 年被调到广州暨南大学，可惜接下来又是“四清”运动，又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关“牛棚”，下“干校”……

1979 年父亲的冤案得到平反。改革开放后，父亲满怀激情重新走上讲台，教授古典文学。可惜平反时父亲已经 61 岁，于 1984 年离休，虽然享受厅局级待遇，去世时每月工资不足千元，分到二室一厅的房子。可幸晚年喜逢太平盛世。离休后他忧国忧民之心不变，仍然笔耕不辍。颂扬真善，鞭挞丑恶。以范坦吾、樊服白、游国民等笔名写下了一百多篇文章，耗尽了最后光和热。父亲在病榻上口述，要我笔录他的遗嘱。遗嘱之一是：“一、不出讣告；二、不去殡仪馆；三、就近将遗体送给暨南大学医学院生理解剖室，供学生解剖之

□ 师友情

用。”写到这里，我哭着请求父亲说，“爸爸，你一辈子这么苦，不要这样做啊！”父亲严肃地说：“一定要按照我的遗愿执行，任何人不得干涉。”为这件事我不知哭过多少次，因为在此之前，我从没听过这样的事，实在不能接受，心中十分痛苦，也十分矛盾。执行吧，我受儒家文化影响，觉得这是不孝之举；不执行吧，是没遵父之命，也属不孝之列，真是左右为难啊！父亲去世那天，经过反复思想斗争，最后决定按照父亲的遗愿执行。

遗嘱之二，是把师长赠给父亲、经历时代风雨、珍藏身边 50 多年的墨宝捐给他的母校清华大学。计有朱自清先生、张奚若先生、罗庸先生手书赠给父亲的条幅；顾颉刚先生手书赠给父亲的诗词两首；闻一多先生亲自为父亲刻制的一枚印章。消息一传出，有人找我劝说，仅朱自清先生写的条幅，如捐给台湾清华大学可获得几十万元的补偿金，其他几件文物可以再商议。我听了之后感到很突然，但想了一下回答说：父亲虽没说明送哪所清华大学，



杨天堂学长女儿杨明箴（右 2）向清华捐赠名师遗墨时留影，左 2 李传信



杨天堂学长保存的西南联大校徽、清华纪念章

但我知道父亲读的是北京的那所，所以我不能那样做，在金钱面前我没有动心，虽然几十万在当时已是一笔巨大的数字。为了不辜负父亲的重托，我赶紧找人重新装裱后，带着儿子，乘飞机护送着这些墨宝到北京，万无一失地把它们全部赠给了清华大学。得到的回报是一本写着赠了这些文物名称的纪念册，一枚清华大学纪念章和这些墨宝的影印件。学校为了表达谢意，还特意从该校档案室里查找到我父亲在北大读本科、在清华读研时亲笔填写的学籍表，并影印一份给我。在研究生的那份表中还清晰地记载着：“参加解放军南下工作团，保留学籍。”

遗嘱之三，父亲口述了一首充满美好愿望的小诗《拾放翁牙慧，示女儿明箴》：“死后原知万事空，但恨文章书未穷。以权谋私结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我含着眼泪说：“爸爸，您认为我这辈子能看到吗？”父亲苦笑着说：“这只是我的愿望。”

值得告慰父亲的是，自父亲捐献遗体的事迹被媒体报导后，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1997 年度广州市已有 12 人捐献了遗体，以后每年都在不断增多。

到目前为止，已有 200 多人捐献了遗体，另有 1000 多活着的人与红十字会签订了捐献遗体的合同。他们把无限的爱留在人间，为提高人类健康水平，为医学事业的发展做出最后贡献的高尚行为，已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

为缅怀遗体捐献者的高尚情操，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秉承“生命在这里升华”的理念，新塘华侨永久公墓无偿提供用地，广州市政府支持，共同精心建造的“广州市遗体捐献者纪念碑”于 2008 年 4 月竣工。当年清明节，我被邀参加揭幕式。墓碑庄严肃穆，木棉花图案的主碑上刻着“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存”

十个大字。六根刻着遗体捐献者姓名的石柱分列两旁。纪念碑的设立，是表达对遗体捐献者的崇高敬意和永久纪念；为遗体捐献者的家人在中国传统的清明节缅怀亲人提供一个良好的场所。今年在新年即将来临之际，红十字会又派人到家慰问，充分说明社会对捐献遗体的行为越来越重视。

云山永立，珠水长流。生命有限爱无限。父亲用一生默默实践着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对祖国、对人民的赤子之心。我在心中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爸爸，您浇灌的爱心之花已经盛开。”奉献，已经让生命升华。

悼念父亲陈乃隆先生

○陈 工 伦肇菁（1980 级汽车）

父亲陈乃隆先生因意外摔倒医治无效，于 2014 年 12 月 21 日逝世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因诺瓦·费而法克斯中心医院，享年 94 岁。去世时子女侍奉在侧。

父亲于 1921 年 9 月 30 日出生于北平，祖籍福建省福州市。童年之后随父陈南曾和母林诗宾先后迁往浙江省杭州市和福建省福州市，并在那里完成中学学业。当高中毕业于省立福州中学（现福州一中）时，由于学业和高考成绩优秀，在被著名的厦门大学录取并被颁予嘉庚奖学金后，他又被当时由清华、北大和南开组成的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的航空工程系录取，进入位于云南省昆明市的西南联大求学，并于 1942 年毕业。之后在位于贵州省大定的中

国飞机制造修理厂实习和工作。期间并考入空军第十二期高级机械班，以第一名毕业后，又被挑选公派美国，进入美国著名的飞机发动机公司普瑞特·惠特尼 (Pratt & Whitney) 受训实习。在回到中国述职和探访亲友后，他再次前往美国并进入位于宾夕法尼亚州著名的里海 (Lehigh) 大学的研究生院攻读，并从 Lehigh 获得金属材料制造工程的硕士学位。1950 年父亲回到中国，并相继工作和居住于昆明、成都、北京、洛阳而后工作定居于北京。

在归国的 40 年间，父亲先是短时间在云南大学担任教授后，随即转入工业界。而后对中国的重工业，包括飞机制造工业、机械工业、汽车工业和农业机械工业的创